



MINORAE

张宝明 著

文言与白话

一个世纪的纠缠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A Century of Entanglement



文言与白话

一个世纪的纠结

张宝明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张宝明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675-1859-9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白话文—汉字改革—研究 ②学衡派—研究
IV. ①H109.4-1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4387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评论

文言与白话:一个世纪的纠结

著 者 张宝明
责任编辑 倪为国 何花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插 页 4
印 张 5.25
字 数 7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859-9/I · 1134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关注中国问题
重铸中国故事

缘 起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是“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是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

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

点 点

2011.8.10

引言 语言变革的戈尔迪乌姆之结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亚细亚的戈尔迪乌姆卫城有一座宙斯神庙，庙内有一辆战车，车轭和车辕之间用山茱萸绳结成一个绳扣。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绳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之王。这个绳结被称为“戈尔迪乌姆之结”。各国的武士和王子都来试解这个结，可总是连绳头都找不到，不知从何处入手。公元前 334 年春天，亚历山大大帝进兵亚西亚。当听说这个绳结的预言后，他凝视绳结，没有动手去解，而是猛然之间拔出宝剑，手起剑落，绳结破碎。在场的人满眼惊讶，继而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齐声赞誉亚历山大思维超凡，天生的亚细亚之王。这样一个胜利的故事，一直在传颂，说这是一种智慧的考验，要有创新的思维。尽管故事可以这样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不由让我感觉有些虎头蛇尾，而亚历山大砍绳方式更是一种避实就虚的讨巧行为。

绳碎了，其实结还在；事情过去了，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种避实就虚的解决方式看上去似乎是决断性的方式，但往往是避开了问题的要点，有时反倒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甚至它会让人感到可以诉诸于某种单纯而激烈的行为来解决问题，并产生可以用这样的行动一举解决问题的错觉。

在我看来，“五四”白话取代文言亦是如此。回到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几场国际战事外交的失败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彻底挫败，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惨淡现实，他们想改革却找不到方法，想战斗却找不到敌人。慌乱无措中，将传统文化认作思想愚昧的罪魁，将文言书写看做社会落后的渊藪。虽然《新青年》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开辟专栏进行“商榷”、“讨论”、“斟酌”、“研究”，但那时的社会来稿还是有选择的刊布。即使是中坚同仁胡适的建言，主撰陈独秀也有把持、纠偏的刚愎、武断做派。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新青年》并没有展开怎样充分的讨论就如此这般了。这从发表在1917年5月《新青年》3卷3号上的通信就不难窥见一斑。针对自己抛出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一直以“切磋”的口吻征求意见，以期周全、稳妥。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

在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后则以舍我其谁的态度急切“定论”。他的回信掷地有声,显示了白话文不可一世的霸气:“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①也恰恰是这个势不可当的锐气让白话文“生米做成熟饭”,连北洋政府教育部也不得不下文“诏安”。“真理”是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证实,但没有经过“讨论”、“征集”、“切磋”、“研究”的“真理”总给人一种压抑之感。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文言文乃是现代白话文的源泉,二者是母与子的关系。《新青年》时期,激进情绪下的同仁所做出的“抽刀断水”式的决断带有硬性的“左”性做派。所有的理性化启蒙色彩都为这一情绪化气质所掩盖,新旧语言传统的重新确立充分体现在文白的决裂上。

如今,除了学古代文学的或做历史文献研究的,已经很少人再接触文言了。日常生活中,我们无论说的写的都已经都是白话,文言已经退出我们的生活,“五四”文白变革对现代汉语贡献不但已经成为历史的定论,而且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短短百十年,历史很淡忘,人也很淡忘,甚至,有一次我和青年们谈起“五四”的文白之争,他们用非常茫然的眼神

① 陈独秀:《通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1日。

盯着我，仿佛我说的是一个不曾有过的传奇故事，仿佛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不曾存在过，百余年那场文白之争没有发生过一样。历史的长河就这样缓缓流淌着，自有其天理命数。我们不能站在历史背后指责历史应该如何如何，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现实如此这般便拒绝反思历史。我的思考是从最近关于恢复繁体字的讨论开始的。我们知道大陆汉语一直在推行简化书写，而台湾还在保持繁体书写，所以两会代表有人提议为了促进两岸统一，需要恢复繁体字。这个提案合适与否暂且不论，我想到的是社会的现代化与汉字的简繁到底有多大关联，现在人们已经忘记了鲁迅“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呼号，忘记钱玄同“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①汉字没有灭，中国也没有亡，台湾保持繁体字，也没有妨碍其现代化进程。从汉字繁简扩大来说，汉语的文白与中国的存亡、现代化的演进之间到底有多大关系，这样一个语言中的“戈尔迪乌姆之结”，当时没有获得争论的空间，现在也远未辨析清楚。可以确信的是，语言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五四”文学革命先驱渲染的那么离谱，而由此说来文言的灭亡或多或少有冤死鬼的嫌疑。从《新青年》同仁

^①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7页。

为寻求良性舆论环境的急切渴望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代启蒙思想家对语言权力(“市场”)的攫取心态。^①通过语言“断裂”来实现现代性最大化的演进,昭示了《新青年》同仁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手段的残酷性。它不但导致了中华传统母语的巨大阵痛甚至是非正常死亡,而且还使得现代文学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这个在硬性挤压状态下降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了自然生成的规律。我们现在一提到“五四”时期的语言问题,总是采用一种文言和白话的斗争叙事,而且好像白话的呼声特别响,文言却没有太多声音。其实从晚清到民国,有很多种不同的文言,报纸、杂志、公文里出现的文言各不相同,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文言也不同,当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白话,这里面的线索其实非常多,情况非常复杂。然而为什么会出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并最终导致了对中国几千年语言传统拦腰砍断的局面呢?

关于新青年同人的武断做派和“文白不争”的历史悲情,我曾经做过专文探讨。^②但“文白不争”背后到底避开了哪些问题,背后还有哪些思想的颀颀与对抗,却没有充分进行探讨。这也就是本论将学衡派纳入研究视野的原因。新

① 对“语言”与“权力”关系的论述,在布迪厄、福柯以及海德格尔等社会学与哲学论著中都有涉及。对此,朱国华在《语言市场与预期价值》中有所论述,参见《权力的文化逻辑》,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② 张宝明:《“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两副面孔》,《学术界》2005 年第 02 期。

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少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便来自学衡派，学衡派在教育部明令学堂修习白话课程、白话代替文言已成定局的时候出来为文言书写代言，为传统文化承命。我曾经在一本书中写过，不读《新青年》杂志，便读不懂 20 世纪的中国，因为在《新青年》上提出的种种命题，是一代启蒙先驱熟读中国之后而凝结出的思想火花，也是中国现代性演进历程中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但同时指出，新青年派先驱在现代性的焦虑下表现得深刻而又激进、理性而又情绪、进步而又偏执，从而使得启蒙在乌托邦色彩不断染浓的情况下从理性走向非理性。这些研究所得我曾颇为自诩，而当看到《学衡》，却发现早已记录在案，《学衡》杂志，承载着一个即将逝去文化传统的辉煌沉落。正源于此，这里将学衡派与新青年派拿出来进行比较，尽管这是文言取代白话已成定数之际的迟到争论，但这里将文言与白话的孰好孰坏分析入理，这里藏着解开语言中的“戈尔迪乌姆之结”的方法。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之间的“文白之争”是文白变革中的著名论争。尽管历史选择了白话，而放弃了文言，但需要明确的是，历史绝非一条直线，绝非单纯的因果方程式，绝非正对邪的胜利，亦绝非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必然性的进步。我们是不承认语言变革问题有什么根本解决的。白话取代言文，表面上根本解决了，然而内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这种变革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文言白话

的嬗替是历史公案,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没有孰胜孰负结论,也不可能有孰对孰错的判断。而且,此中知识分子的书写选择总与自我内在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总是在对时代总体叙述意识形态的迎合或对抗中建构自我的价值意义。历史中,无论倡导白话还是坚守文言,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没有任何一方自愿放弃自我立场,坚持呵护思想独立阵地的争鸣,一个孕育着新时代的思想预言,一个承载着即将逝去时代的辉煌沉落。本论即是从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戈尔迪乌姆之结”切入,谈到舆论家与学问家的文化博弈,再到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颉颃。从语言到话语,从话语到思想,逐层深入,挖掘文言白话论争背后隐含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特别是话语权力的痕迹,这会让我们触摸到文言白话的变革所承载的现代中国历史上语言博弈、思想冲撞、社会变迁等复杂内容。

- 1 **引言 语言变革的戈尔迪乌姆之结**
 Introduction: The Gordian Knot of Language Reform

- 1 **一、文字与文学：“剪不断、理还乱”的“语文”情结**
 Part 1 Characters and Literature: Language Complex Which is Impossible to be Delineated and Clear Cut

- 10 **二、话语与权力：启蒙家与学问家的文化博弈**
 Part 2 Discourse and Power: The Cultural Game Between Those Enlightened and Scholars

- 23 **三、文言与白话：在“人文”与“人道”之间（上）**
 Part 3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 (I)

- 75 **四、文言与白话：在“人文”与“人道”之间（中）**
 Part 4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 (II)

- 105 **五、文言与白话：在“人文”与“人道”之间（下）**
 Part 5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Between “Humanism” and “Humanity” (III)

- 123 **结语 没有胜负的语言战争**
 Conclusion: A Language War without Outcome

一、文字与文学：“剪不断、理还乱” 的“语文”情结

新文化运动伊始，作为新文学倡导者中坚的胡适“暴得大名”。当《新青年》几将阻挡白话文的障碍廓清之时，胡适也因为与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并肩作战而成为反对派的靶心。1922年，《新青年》功成名就、白话文如日中天。是时，创刊于南京的《学衡》杂志便开始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发难。胡先骕的《评〈尝试集〉》指名道姓。为此，敏感的胡适在日记中不无矜持地写道：“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①在梳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他顺势回应梅光迪长篇累牍的热评时更加自信地写道：“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

^① 胡适：《胡适全集》第2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06页。

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①胡适对白话文学果实的严防死守并不难理解:白话文的纯粹性、科学性、逻辑性与生俱来,它不但具有语言(文字)的清晰性,还兼具或说捎带了(语言)文学的自我化、个性化创作原则,具有启蒙的多功能特征。这正是新青年派引以为荣的理由,也是以此推动新文学和新文化建设的强大引擎。但是,学衡派可不这么看:文言文是中国文化元典中最简约、凝重、精雅的语文,作为母语它已成为不可割舍的思维工具,其表达能力具有不可覆盖的原初意义。于是,以“文学”观念为由头的文白之争旷日持久地展开。

胡适以“历史的文学观念”为杀手铜直奔主题:“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以历史时段不同而不同,即“因时进化,不能自止”。^②新青年派在胡适的倡导下引吭高歌,为“死了二千年”的“古文”发了“讣告”。文学的进化是直线的进化,没有螺旋式的曲线,有的只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性。正是这股勇往直前的开创决心,使得白话文势如破竹、新文学高歌猛进。相形之下,《学衡》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0—342页。

②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日。